

北京图书馆藏

42866

中文资料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译 稿

第 八 辑

民国名人传记辞典

第二分册

(美)包华德主编

沈自敏译

林东民校

中 华 书 局

1980年2月

58

2

B007\29

K258

13

2-2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译 稿

第 八 辑

民国名人传记辞典

第二分册

(美)包华德主编

沈自敏译

林东民校

(征 求 意 见 稿)

中 华 书 局

1980年2月



A 791538

《丛稿》门类		辑 次 (内 容)	发行时间
大 事 记	序 编	(1905.8—1911.10)	1978. 1
	第一辑	(1911.10—1912)	1973.12
	第二辑	1913年	1975. 8
	第三辑	(1914年、1915年、1916年)	1975. 8
	第四辑	(1917年、1918年)	1976.11
	第五辑	1919年(民国八年)	1978.12
	第六辑	1920年(民国九年)	1978. 7
	第七辑	1921年(民国十年)	1978. 1
	第八辑	1922年(民国十一年)	1979. 7
	第十一辑	1925年(民国十四年)	1978. 8
人 物 传 记	第一辑		1973.12
	第二辑		1975. 4
	第三辑		1976. 6
	第四辑		1977.10
	第五辑		1978.11
	第六辑		1979. 5
	第七辑		1979.11
专 题 资 料 选 辑	第一辑	《中国社会党》等	1976.11
	第二辑	《清末新军编练沿革》	1978. 5
	第三辑	《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稿》	1978. 3
	译 稿	第一辑 《1895—1912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	1978. 6
		第二辑 《史迪威资料》	1978. 2
		第三辑 《民国名人传记辞典》第一分册	1979. 6
		第四辑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二卷第一分册	1979. 7
		第五辑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一卷第一分册	1979.10
		第六辑 《马歇尔使华》(一)	1979. 7
		第七辑 《汇丰——上海香港银行》	1980. 1
		第八辑 《民国名人传记辞典》第二分册	1980. 2
	增 刊	第一辑 《孙中山年谱》(上)	1976.11
		第二辑 《孙中山年谱》(中)	
		第三辑 《孙中山年谱》(下)	
		第四辑 《李公朴先生年谱》等	1978. 3
		第五辑 《黄炎培日记摘录》	1979. 1
		第六辑 孙晓村等回忆录、罗隆基日记	1980. 1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编印凡例

一、编印《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的目的在于组织协作，征求意见，反映工作进展情况。

二、《丛稿》暂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负责编辑。

三、《丛稿》专登有关中华民国史资料一类的稿件，供历史教学、研究工作参考每辑字数不限。

四、所有中华民国史初稿及其所附资料，一般都先在《丛稿》登载，广泛征求意见，然后改为定稿。但《丛稿》登载过的稿件，将来《中华民国史》一书反其所附资料不一定全都编进去。

五、欢迎投稿，但只限于中华民国史及有关资料。

六、欢迎对《丛稿》提出批评意见。

七、译稿如引用，请核对原文。

目 录

张道藩	(1)
张作霖	(8)
张宗昌	(12)
章宗祥	(17)
张资平	(20)
张元济	(21)
赵尔巽	(25)
赵恒惕	(27)
赵元任	(30)
陈 诚	(36)
陈济棠	(45)
陈其美	(49)
陈嘉庚	(51)
陈锦涛	(57)
陈庆云	(60)
陈炯明	(61)

陈友仁	(69)
陈衡哲	(74)
陈光甫	(79)
陈公博	(85)
陈果夫	(91)
陈立夫	(97)
陈 蒙	(104)
陈铭枢	(107)
陈璧君	(112)
编者说明	(115)

张道藩

张道藩(1897——)，在南京和重庆担任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高级职务，1942年曾随同蒋介石访问印度，1952—1959年在台湾任立法院长。

张道藩，贵州盘县人，他的家庭是贵州有名的世代书香之家。张道藩出生前的约一百年中，他家族里出了六名进士。张道藩的祖父于三十二岁时死去，家道因而中落。张道藩的父亲虽是个博学之士，但却屡试不中，找不到机会象他的祖先那样当官作吏。张道藩从他的父亲习读中国典籍。1911年当他在本地高小读书时，通过他留学日本的亲友寄回的报刊而接触到当时的激进知识界的思潮。

张道藩于1914年毕业后，无力继续上学，1915年2月，十八岁时受聘在附近的普安县一所私立初小教书。他在高小毕业时名列第一，所以能教数学、音乐、绘画、书法等各种课程，只有体育课使他感到为难。

那时他已与秘密的政治活动有间接联系。他七叔是反袁运动的中华革命党成员，委托张保藏本地会员名单和其他文件。1916年袁世凯死后，随同任国会议员的五叔去北京继续上学。他过天津时去拜访他叔父的朋友严范孙，经严之劝，他进了南开中学读书。

1917年6月，国会解散，张道藩的五叔失去了议员席位，无力资助他继续读书。幸而他的五叔祖任绥绥烟酒专卖局长，为张道藩在包头分局谋了一个职位。在包头期间，他通过函授学习英语、日语，两年后决定重新上南开读书。他回南开时，正好是五四运动时期，他在课堂上花的时间很少，而用很多精力从事群众鼓动宣传。当时吴稚晖等人倡议勤工俭学，张道藩决定去法国。他不顾叔祖反对，于1919年11月从上海去巴黎。他在上海等船的时候，他和同行的十七名赴法学生，一起得到孙逸仙在上海寓邸的接见。

1920年1月1日抵伦敦后，留英的中国学生对勤工俭学的学生们说，如果法语不流利就很难在法国找到工作，张道藩因此决定在英国留学。他叔祖资助

他进曼彻斯特的一所私立高等学校读了一学期，然后进伦敦一所天主教学院。1921年，他是通过伦敦大学斯莱德艺术学院入学考试的第一中国学生。1924年毕业后，他去巴黎，在全国最高艺术学院学习了两年。

张道藩在伦敦时，曾协助组织过一个工商学（工人、商人、学生）各界协会，其目的在改善华侨的社会生活和文娱娱乐。1922年冬，他不参加政治活动的决心动摇了，经刘纪文、邵元冲的劝告，加入了国民党。第二年，他被选为国民党伦敦支部负责人，

1926年4月，他离欧洲回国，6月底到上海。他在上海作了一次关于裸体问题的公开讲演震惊了保守的中国人，因此被逮捕。

广东省政府农工部长刘纪文邀他去参加工作。他离开上海去革命气氛热烈的广州。张道藩先为刘纪文秘书，1926年秋刘纪文去国民革命军司令部工作后，张道藩任农工部代理部长。1926年11月，国民党党务负责人陈果夫在一次会议中遇到张道藩，请他去贵州主持党务。张乐于回本省，接受了任务，1927年1月去贵州。当时贵州由一个专横的军阀周西成统治，他禁止国民党在他的统治地区内活动，1927年5月3日张因拒不交出电报密码而被逮捕。1927年9月18日张获释后，没有人再敢庇护他了。他在住医院医治好他狱中所受创伤后，12月离贵州去上海。

1928年2月，经陈果夫、刘纪文推荐张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秘书，该部为陈果夫所控制。9月，张任南京市政府秘书长。1929年3月，他以南京代表身份参加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他因选举程序问题和胡汉民争执而惹怒了胡，他不得不离去南京的工作岗位，任江苏省党部委员。

张于1929年夏任青岛大学教务长，他在山东耽了没有几个月，去浙江任浙江省政府教育厅长。几个月后，陈果夫的兄弟、国民党组织部长陈立夫聘张道藩任副部长。自此，张道藩来往于南京杭州之间处理党政事务。1931年9月，日军侵占东北，学生群众因反对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怒而毁捣张道藩在汉口的住宅。张道藩不得不当了替罪羊，辞去浙江的所有职务，去南京任蒋介石的私人秘书。

1932年11月29日，张道藩任交通部次长，以后他还担任了其他部的次长。他在1935年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6年秋，他从交通部调到内政部。1938年1月，他随同他的上司陈立夫进教育部为次长，并协助陈立夫为国民党中央社会部副部长。1938年下半年，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文化运动委员会资历较深的委员。1939年任中央政治学校教务长，那是训练国民党干部的一个最高机构。1941年提升为该校副校长并主持校政，该校一直由蒋介石担任校长。

1942年2月，张道藩随同蒋介石访问印度与甘地和尼赫鲁会晤，在会晤时，蒋夫人任翻译，张道藩作记录。张道藩本人还和尼赫鲁三次长谈，了解印度国大党的组织和力量。1942年12月7日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1943年10月调任中央海外部，1943年12月，日军进迫贵阳，他回本省贵州组织民众抗击日军。

1945年，张道藩进入了国民党核心中的最高地位，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1948年选为立法委员，到台湾后，在1952年为立法院长，1959年辞去院长职，继续任立法委员。

张道藩在国民党中国的文化、文学、艺术组织中还起了领导作用，他有时参加业余戏剧演出，他创作和翻译过几个剧本，例如《赎身》、《蜜月旅行》、《谁的过失》、《密电码》（电影剧本）、《最后的堡垒》、《真诚的爱国主义》，先后于1934—1937年在上海出版。他还翻译过康斯坦勃的《近代欧洲绘画概要》和桑赫尔的《遗忘了的原因》。

张作霖 字：雨亭

张作霖（1873—1928.6），人称为大帅，统治东北的军事头目。最初，他是奉天地方军的一名头目，1919年后统治了满洲，成了一个独立王国，直到他死去。1924年后他的势力扩展到北京，成了革命军统一全国的一个障碍。后来他的儿子张学良继承了他的满洲统治者的地位。

关于张作霖的早年生活，在1928年他去世不久所编的家谱中提供了一些资料。根据这些资料来源，他生于奉天海城县，行四。长兄幼年夭折，二兄是个土匪被处死，第三个是姊姊。他父亲张有财约死于1882年，他母亲再嫁给村里的一名兽医。年轻的张作霖既出身农家，又未受过教育，当时看来似乎没有什么出息。

他在二十岁前就开始当兵，隶于宋庆的毅军，参加过1894—1895年中日战争。战后回奉天组织武装防卫本县。他颇有领袖才能，建立了他自己的一支实力充裕组织良好的部队。他在奉天训练地方武装时，和后来当伪满洲国总理大臣的张景惠、吉林督军张作相来往密切。因为他不在清政府的军事编制之内，所以被看作是土匪。

1904—1905年日俄战争中，张作霖的部队成了日军的一支非正式的友军，经常袭击俄军。在这次战争中，张作霖增强了军事实力，在南满树立了威望。战后，他和盛京将军赵尔巽谈妥，编其部队为一个团。张作霖从此找到了一个政治靠山，虽然当时并未立即走运。后来，赵调归京师，但于1911年4月又回沈阳任东三省总督。辛亥革命前夕，赵尔巽所统的部队有四十营，分为五路，张作霖为前路巡防队统领，驻洮南府。

武昌起义，赵尔巽从辽源、通辽一线调后路巡防队至沈阳，张作霖感到政治机会来到，他自作主张进驻沈阳。赵尔巽对此默加承认，不久又让他统率驻沈阳铁岭一线的中路巡防队。蓝天蔚统率的第二混成旅发动叛变，张作霖很快把叛变镇压下去，他对维持东北地方治安作出很大贡献。

民国政府成立，1912年袁世凯掌握了政权，东三省名义上受北京统治。奉天巡防队改编为第二十七、第二十八两师。1912年9月，张作霖升为少将，统率第二十七师，原左路巡防队统领冯德麟统率第二十八师。

1912年11月，张锡奎继赵尔巽为奉天都督，他与张作霖、冯德麟早有交情，所以颇能得到他们的服从和尊敬。1915年袁世凯准备在北京称帝，张作霖、冯德麟起初表示拥护，但袁世凯委任了他的亲信段芝贵为东三省军务督理兼奉天督军。段芝贵的父亲段玉衡（译音）在张作霖几年前和清政府协谈时曾作过担保。段芝贵的任命很明显是对张作霖在满洲的政治雄心的挑战；袁世凯在

任命段芝贵的同时，命令张作霖第二十七师调往湖南。

显然由张作霖自己在背后策划的“群众反对”张的调动，张作霖才免于调往湖南。1916年12月，反袁帝制运动已在云南掀起，张作霖故意让人散布满洲将告独立，计划成立保安会。张作霖威胁段芝贵的权力，袁世凯如要保持奉天安宁，就只能给张作霖委以重任。段芝贵辞职离沈阳，张作霖即被委为奉天巡按使。

袁世凯死后，张作霖着手巩固其在南满的地位。他控制二十七师，任奉天督军兼省长。二十七师五十三团团长汤玉麟打算反对张作霖。事被发觉，汤玉麟带了少数部队逃往新民，张作霖令张作相以骑兵追击，经冯德麟二十八师五十五团团长沙海鹏出面干预，汤玉麟才获救。

张作霖拟对此不加追究，但冯德麟却想利用这个机会，他和第二骑兵团团长吴俊升联系企图倒张作霖。这个计划张作霖知道后，他多方调动，派二十八师五十六团去辽西剿匪。1917年5月底张作霖调二十七、二十九师袭击冯德麟，宣布撤换师长，冯德麟为了解除他的困境，和张勋谈妥，他仓促离去，参加七月间的张勋复辟活动。从此，张作霖又控制了二十八师。

1917年，张作霖又取得了一次胜利，他的支持者孙烈臣由内阁总理段祺瑞任命为黑龙江省督军。1918年，张作霖依仗其奉天的军力，支持段祺瑞、徐树铮向直系的冯国璋施加压力。段祺瑞再次出任内阁总理后，1918年9月，任命张作霖为东三省巡阅使，以此作为酬谢，这一年中，张作霖又增加了七个混成旅的军力。1919年中，吉林督军孟恩远反抗张作霖的领导，张作霖将他逐走，任命张的支持者鲍贵卿为吉林督军。自此，他完全控制了东北，在他最后的十年中，实际上东北已成了他的独立王国。他这几年在华北的政治军事活动，虽无成效，但由于日本的支持，他完全控制了长城以外东北各省。

1917—1920年间，张作霖、段祺瑞互相利用，密切合作。1919年下半年，徐树铮不顾张作霖视蒙古为东北势力范围，在蒙古一带建立个人势力范围，因此与张的联盟关系破裂，但段祺瑞则继续支持徐树铮。张作霖和曹錕等直系军阀联合，直奉联军多次挫败段祺瑞皖系的安国军，第二天段祺瑞辞职。战争7月18日直军在保定附近击败段祺瑞皖系的安国军，第二天段祺瑞辞职。战争

获胜者在新政府的组成问题上未能达成协议。1920年8月中，奉军退回满洲，带走缴获的段军大量军械装备，这更加重了直系军阀和张作霖的不和。

当时外蒙情况的发展，吸引了张作霖和日本方面的注意。1921年春，斯坦培格的白俄旧军干涉失败，3月，蒙古临时人民政府在乌兰巴托成立。5月，俄国红军进入外蒙。外蒙当局虽已宣布脱离中华民国，但民国政府仍任命张作霖为蒙疆经略使，以维持该地区的中国的势力。这一任命，使张作霖的势力伸向内蒙，达到戈壁以南。张作霖的亲信在热河、察哈尔、绥远三个特区担任领导职务。1921年6月6日，俄国红军和蒙古联军占领乌兰巴托，7月10日，改临时人民政府为蒙古人民革命政府。苏联支持蒙古新政府，并于11月5日签订友好条约。征蒙的大量军费就落入张作霖腰包。他又转向华北的政治活动。

1921年12月，张作霖把他选择的工具梁士诒扶上台在北京当内阁总理。张作霖又和段祺瑞联合，他在华北的地位炙手可热，因此引起他的名义上的同盟者直系的警觉。曹锟、吴佩孚不愿将华北让给奉系。1922年1月，吴佩孚迫梁士诒去职，张作霖力图保持梁的职位，但并未奏效。张作霖调动部队进入关内，1922年4月爆发第一次直奉战争。4月19日张作霖通电声称此举乃系统一“后方”。4月22日，曹锟通电反对，称统一之举不需使用武力。其他北方军阀，包括冯玉祥在内，支持曹锟。1922年5月1日张作霖声称今后东北问题当由沈阳东北当局单独处理，满洲方面正与广西、广东的“西南当局”取得合作。张作霖暂时和这些松散的集团联盟，其中包括孙逸仙。

5月3日，在北京附近的长辛店一战，奉军失败，张作霖将部队撤回东北，吴佩孚统治了华北。总统徐世昌在5月1日撤消了张作霖一切职务。但是冲突并未结束，因为张作霖拥有十万兵力，在东北和日本又有特殊关系，他自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充实军力准备再次争夺华北。

1923年初，孙逸仙派汪精卫和张作霖及段祺瑞的支持者浙江督军卢永祥商谈，劝说他们以国民党政纲为基础，结成三角同盟。张、卢坚持以吴佩孚必须推翻，中国必须统一为结盟的先决条件。

张作霖在沈阳执政的地位，造成当时北京政府的对外关系复杂化。张作霖的政府拥有主权国家所具有的职能，其中包括与外国政府签订条约。这种尴尬

的局面在有关中东路问题上就很明显了。1924年5月31日，北京政府和苏联签订了一个规定中东路地位及两方的路权的协定。要使该协定生效，必须得到张作霖同意，因为中东路在满洲境内行驶。北京政府派专使去沈阳征求他的同意，但此行失败了。张作霖在中东路问题上的处境是狼狈的，如果他违反北京政府正式签订的协定不见得能得到日本的支持，并且他又准备和吴佩孚重新开战因而又不敢恶化对莫斯科的关系。

苏联政府利用了这个机会，派代表库兹尼佐夫和张作霖在1924年9月20日单独签订了一个沈阳苏联协定，在这个协定中俄国人所获得的中东路的权益和1924年5月的协定中所载的相似，而那个条约却是张作霖所拒不承认的，这样，俄国暂时又恢复了在北满的特殊地位。1924年9月协定另一个特点是，张作霖无视北京政府在有关满洲问题上不征得他的同意而签订国际条约的权力，张作霖虽因此取得了面子，但创立了一个危险的先例。沈阳协定承认了东三省张作霖政府是反抗中央政府的一个独立的政权，这为1932年满洲国宣布独立打下了基础。

1924年9月1江浙战争发生。张作霖立即宣布支持卢永祥并向热河进兵，在张进兵同时，吴佩孚向省会承德增兵。9月5日，孙逸仙发表宣言反对曹锟、吴佩孚，9月18日宣布即将进行的北伐，旨在推翻军阀及其靠山帝国主义。

10月初，张作霖袭击山海关，吴佩孚往北面调兵守卫山海关，因吴部冯玉祥倒戈而形势大变，冯弃守古北口，直向北京进军，举行政变，10月又倡议和平解决问题。冯玉祥在北京的政变是事先与张作霖商定的。冯玉祥军和奉军张宗昌部切断布防在长城东端的吴佩孚部的退路。此次战役以直军惨败告终，从而使奉系在华北的地位空前强大。

北京的新政权是张作霖、冯玉祥、段祺瑞的联盟，但他们一旦获得胜利，联盟就开始瓦解。其中重要问题之一是和华南国民革命力量的关系问题。在南方，孙逸仙、国民党正和共产党联合而日趋巩固。张作霖反对革命变革，1924年12月，他会见来北方和实力派军人商谈国事的孙逸仙。他感到孙逸仙的主张和他与段祺瑞的大不相同。孙逸仙已身患重病，12月底才到北京，冯玉祥

已和他的同盟者不和而散伙，张作霖、段祺瑞显然反对孙逸仙所希望建立的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新政府。1925年3月，孙逸仙去世，局势更加混乱了。

张作霖和奉系军阀向南方推进，1925年初到达上海地区，并准备沿陇海路向西推进到河南地区。但在这一年里他不断遇到拥有武装的军阀的抗争。在长江下流的孙传芳于1925年10月击溃奉军，张作霖昔日的盟友冯玉祥又从河南加以胁迫。鉴于军事形势不利，又由于他向段祺瑞施加政治压力所造成的在北京的恶劣处境，张作霖将他的主力部队撤往长城，调出关外。

当时冯玉祥和孙传芳、吴佩孚联合，纠集部队从华北驱走奉军，张作霖派代表游说冯玉祥意在拆散他们的联合，冯玉祥表示不另结新盟而赞助和张作霖联盟，实际上以此争取了奉军将领郭松龄叛反他的上司张作霖。1925年11月，郭松龄通电要张作霖让位给他儿子张学良。郭松龄此举的目的在于使冯玉祥国民军袭击华北时，转移张作霖的注意力于满洲。郭松龄的行动即使没有苏联的实际帮助，也显然得到苏联同情。由于日本立即干预沈阳地区的局势，此举失败，郭松龄被捕，1925年12月被处决。

苏联和日本为了在满洲这个要害地区争夺势力范围，因此他们都密切注意满洲形势的发展。张作霖由日本官员的间接帮助战胜了郭松龄，但是对局势的稳定起不了多大作用。1926年1月，他又发泄他的反俄情绪，为了想干脆取消苏联在满洲的铁路权益，1926年1月21日，东北当局横蛮逮捕中东铁路苏方总办伊凡诺夫，三名苏方经理，和多名苏方公民。第二天，莫斯科也同样以横蛮态度提出最后通牒，限三日之内释放被捕人员，恢复铁路正常运行。苏方的军事威胁迫使张作霖退让，1月24日在沈阳签订协定，恢复铁路原状。

在国内政治领域内，张作霖在1926年1月和吴佩孚联合行动，吴佩孚是张作霖的当然同盟者，因为他们两人都力求对冯玉祥加以报复。冯玉祥慎重估计了对方能集结起来向他进攻的军事实力，决心辞离各职去莫斯科访问。他的国民军在华北被击败，退回到内蒙地区。这一年，以广州为基地的国民革命军在7月开始北伐，经湖南而入长江流域。奉军和长江下游的孙传芳达成协议，1926年12月，北方军阀正式联合共同抵御由南方汹涌而来的革命军。12月1日，他们在天津开会，宣布成立安国军，以张作霖为总司令，孙传芳、张宗

昌、阎锡山为副总司令。吴佩孚虽加入了这个联盟，但他不为张作霖所信任，所以没有担负司令职务。

1927年春，张作霖在北方的地位受到沉重打击。唐生智、张发奎率领的革命军强攻在河南的奉军，而冯玉祥又表示同情国民革命，从侧翼攻击张作霖的部队。5月28日，张作霖下令奉军南线部队撤至山东、直隶，6月5日，阎锡山宣布投从国民革命军并劝张作霖加以效法。6月18日，张作霖公然自封大元帅，这是袁世凯、孙逸仙曾拥有过的职称。他并表示要留在北方首都。他在北京把持了最后的短命的至高地位，实际上意味着这个早已没有实权的北京中央政府确已终结了。

张作霖在北京居于尊位的最后一个阶段，中苏关系更加恶化，这在相当程度上由于蒋介石1927年春反共政变而加剧。张作霖自日俄战争以来对俄国人，无论白俄或赤俄一贯心怀疑窦，他并不以1926年中东路事件的失败为戒，又对华北的苏联利益和苏方代表进行了一系列沉重打击。2月28日，张宗昌扣留驶往汉口的苏联船只“潘姆亚·列宁娜”号。可能由于张作霖获得情报证据，因而袭击了苏联驻北京使馆。4月6日，张作霖下令由北京警察厅警察和他的部队进使馆区搜查苏联使馆宅邸，劫走中文俄文档案数车，其中有苏方特工和共产党在中国活动的材料。同时又逮捕了三个月前就躲藏在苏联使馆内的李大钊和其他共产党人。

中国民族革命兴起，1926—27年蒋介石的北伐军向北方挺进，这件事引起了日本田中将军为首的内阁的关切。日本的有势力集团认为中国本部的冲突可能会扩大到华北以至满洲，那样就必然损害他们的特殊利益。田中任总理大臣后，即促张作霖手下的日本顾问和张作霖商讨兴建满洲五条铁路的财政建筑问题。1927年，日本公使芳泽谦吉和张作霖的总参议杨宇霆在北京也进行了对话。这一些行动，都是为了使中国和世界都了解到日本继续视满洲为其特殊势力范围的意图。1927年5月底，国民革命军进占河南后，将进迫山东，日本借口保护侨民和财产派部队进驻山东。

1927年夏，东京催促张作霖采取将部队从华北撤到满洲的良策，以便得到日本帮助而巩固其地位。1927年中，张作霖估计，由于华中国民革命阵线内部

的分裂扩大，他在华北的地位可能还有希望。

1928年4月，国民革命军又由蒋介石统一领导，向北方最后进军。5月初，日本又在山东省会济南进行干预，企图牵制国民革命军攫取日本在那里的权益。1928年5月18日，田中内阁同时向北京、南京发出照会，明确提出其所谓积极的日本政策。照会警告说，华北倘仍动荡不安，“日本政府将不得不采取适当有效步骤以维持满洲的和平和秩序”。东京又警告说，日本将阻击“败兵或追截部队”进入满洲。又特别警告张作霖说：他的部队不准撤往长城以北，除非其部队和平地撤离北京。

这样，张作霖在北京的地位毫无指望了，他成了国民革命军统一中国和日本开发东亚计划的绊脚石。张作霖对日本的警告非常气愤，但他认识到没有其他现实选择的路可走，只得屈从，撤离北京。1928年6月1日他向驻北京的外国使团告别，6月3日离北京去沈阳，6月4日晨五时半，张作霖的专车遇炸翻毁，张作霖身受重伤，几天后死去。出事地点在沈阳近郊南满路和京沈路交叉处的一座桥梁。这次谋杀事件，显然是事先妥为布置的，埋电线、雷管、炸药的准备工作需要好几个小时。一般都认为这次谋杀是日本人干的，此后查明系日军参谋河本大佐等人布置行动的。他们刺杀张作霖，是实现关东军占领满洲的整个庞大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

1928年6月张作霖大帅之死，结束了满洲近代历史上引人注目的一页。他的长子张学良少帅，还在沈阳巩固权力，维护满洲的张家王朝达三年之久。

张作霖身材瘦小，容貌雅致，看起来不象是一个令人生畏的满洲军阀。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前，有一个西方记者在沈阳访问过他，据该记者的描写，张作霖“瘦弱的小个子，棕黄的眼睛炯炯发光，笑容可掬，举止文雅”，他又说，倘偶然与张作霖相遇，会认为他是一个“沉浸在专心研读孔子论语的恬静生活中的人”。他的照片也给人以相同印象。事实上，他虽自持庄重，但一旦发作，便粗暴凶残。他机灵但无才智，他善洞察但不敏锐。张作霖出身贫寒农家，而他却使张氏家族有财有势，这是民间熟知的典型故事，当时的观察者们听到大帅被刺的消息后，激于反日情绪而对之更加以渲染。

由于环境和地理条件的关系，在张作霖活着的时候被认为是亲日的。他

最初是在日本扶持下上台的，他为维护日本的利益充当了制止苏联势力在东亚大陆扩张的有效工具；而日本人则明里或暗地支持张作霖在满洲的统治。他死后，不少中国作者称赞他为了在大事情上抵制日本，因此在小问题上向日本妥协让步，并认为他在同日本打交道时一贯机灵警惕。事实上，日本支持张作霖并非日本协同一致的国家政策，对满洲应采用何种适宜的行动方针，在日本的军政人员中间往往有不同意见。

张作霖所实施的反覆无常的政策，他的投机取巧的态度以及他的专横统治，常被人指责，但他的积极成就也得到重视。正当国内混乱分裂，日俄在满洲存在着相互争夺的政治和军事利益的情况下，张作霖确实使东三省保持高度稳定达十多年之久。张作霖用以统治其地区的力量，有几方面因素。经济上，他依靠满洲的农业资源和税收；军事上，他依靠扩建铁路网和聘请外国专家发展沈阳兵工厂；在满洲相对平静的局势下，他能发行地区货币并维持相当稳定的币值。张作霖进兵华北，严重地涸竭了他在满洲的财源，并且部分地抵销了他在满洲地区统治的积极成果。张作霖统治满洲的时候，国内军阀混乱时的物力损毁，农业上、经济上的瘫痪，人力摧折这些现象并未在满洲出现。

矛盾的是：张作霖的所作所为又往往促成了二十世纪中国的政治统一运动。他向华北扩充势力，他在华北军阀政治斗争中的权力平衡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这样他就敦平了地域性和全国性的界限，而使满洲成为全国政治结构中不可分割的一部份，因此，他为东三省最终从政治上、经济上统一于全国开拓了道路。

张作霖除长子张学良外，还有几个儿子。张学思（1903—）毕业于北京汇文中学和南京中央军校。他对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监禁一事深有感触，他自己也在西安事变时被拘留到释放蒋介石时为止。后来，他在张学良旧部万福麟五十三军中服役，递升为上校。中日战争时，他对国民政府在抗日问题上采取消极政策表示不满，因此投入共产党军队的吕正操、聂荣臻部。中日战争末期，他在共产党冀热辽军区的一个分区担任司令。1945年后，他回满洲旧地参加国内战争。1948年10月，共产党进占沈阳时，他也在那里。1949年后，他任辽宁省主席、东北行政委员会委员一直到1954年，并担任过沈阳东北大学校长之